

经。有些寺庙，还将卷帙浩繁的《华严经》建成“转轮藏”，供信众礼拜，并有僧人编写了《华严经普贤菩萨修证仪》、《华严经海印道场忏仪》等实用的修行仪轨，使华严的影响更为普及。

当时讲习《华严经》的风气很浓，那位对黄庭坚写作艳词十分反感、严加呵斥的圆通法秀禅师，就很擅长讲解华严。法秀（1027—1090）是云门宗天衣义怀系僧人，在当时的影响很大，“云门宗风，自是兴于西北。士大夫日夕问道”。他号称“铁面”。黄庭坚《小山集序》里记载了法秀对他的呵责：“余少时间作乐府，以使酒玩世。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，于我法中，当下犁舌之狱。”而据《续传灯录》，黄庭坚正是由于法秀的呵斥而“悚然悔谢”的，“由是绝笔，惟孳孳于道，著发愿文，痛戒酒色”。

同时，佛教居士们研究华严的热情也很高涨，据《罗湖野录》记载，蒋颖叔曾作华严经解三十篇，“颇负其知见”。他与法秀为方外友，而法秀却毫不顾情面，将蒋自负解华严之辞一一驳倒（事见《释氏稽古略》卷四，《大正藏》史传部卷四九）。元丰期间，黄庭坚所接触的法秀禅师与蒋颖叔都是《华严经》的研究者、传播者，而黄庭坚在作《发愿文》之前正好谒见了蒋颖叔。这些应该都是引导黄庭坚对华严发生兴趣的重要因素。

黄庭坚在发愿之后，对《华严经》一直兴趣不减，并且推动相关释论的刊刻。他有一封《与范长老》（《宋黄文节公全集》续集卷六）的信函，信中写道：“《华严经》未承来谕，已施与方广，并为作《华严阁疏》及《自开疏》去矣。渠识得法身本智乃历历，而于涸和

（指化导方便）绝少功，故聊助之矣。闻成都乃有《华严大疏》，但二十五千便可成就，果尔，为寻一好事者致来……”说明他曾将《华严经》布施给当时的方广寺，并特别为《华严经》的藏经阁写就疏文。《华严大疏》本名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，有六十卷，是唐代“华严疏主”澄观大师所著。黄庭坚有意通过澄观大师的华严释义深入地研析这部经典。他被贬黔州时，还愿意为唐代著名华严学者李通玄所著的《华严合论》作校对工作，以保证这部艰深的释论能够正确无误地刊行于世，其《与秦世章文思》（《宋黄文节公全集》续集卷三）中言：“《华严合论》承已干置，此非小缘，印成，请三两看经僧遍读，点检得业无重复脱漏，则方成器。若早得来尤幸，不肖与范上人若为公看数遍，可不孤法施之心也。”

不仅是《发愿文》受到《华严经》的启发，山谷的诗文中也有多处运用了华严的名相与意境。如《题吉州承天院清凉轩》一诗：“菩萨清凉月，游于毕竟空。我观诸境尽，心与古人同。僧发侵眉白，桃花映竹红。傥来寻祖意，展手似家风。”首二句即是出自《华严经》卷四三：“菩萨清凉月，游于毕竟空。垂光照三界，心法无不现。”当然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，《华严经》中的“心、佛、众生一体”、观世间如梦如幻如化等思想对黄庭坚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，并广泛渗透到他的诗文创作中。目前学界对黄庭坚佛教信仰的研究多数集中于禅宗思想的影响，而《华严经》和其他经论对他的浸染，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去深潜挖掘。

[作者单位：北京语言大学]

明代作家胡侍生平及著述考辨

张世宏

胡侍是明代中期的诗文作家，与“前七子”中的何景明、康海相友善，诗文往还，曾是“前七子”文学复古风潮的积极响应者。正德年间，胡侍在刑部任上，与同僚张治道、薛蕙、刘储秀等“约为诗会，并以诗名都下，都下称‘西翰林’”（乔世宁《刑部主事太微张公治道墓碑》语，据焦竑《国朝献征录》卷四七）。胡侍在正德诗坛一度“与信阳何中舍、谯郡薛考功齐名”（语出王兆云《皇明词林人物考》卷六，何中舍即何景明，

薛考功指薛蕙），但嘉靖以后，仕途舛蹇，诗名渐微。胡侍早期深受李梦阳复古思想的影响，中年以后的文学观念和风格则有较大的变化，“学不泥往，文不附时”，“诗文简洁精恣，自成家束”（《皇明词林人物考》卷六）。所以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才说：“承之诗原北地（李梦阳），而五言颇近信阳（何景明）。弇洲称之云‘虽于风雅未悬合，往往时材骨骼殊’，亦不失实。”

关于胡侍的基本情况，部分晚明文獻偶有述考，但

多语焉不详。张时彻辑《皇明文范》于胡侍名下题曰：“胡侍，咸宁人，号蒙溪，鸿胪寺少卿。”凌迪知编《国朝名公翰藻》称：“胡侍，字永之，陕西咸宁人，鸿胪寺少卿。”陈子龙等编《皇明诗选》则说：“胡侍，陕西人，嘉靖中进士，官监察御史。”清初，钱谦益汇辑有明一代诗歌文献，编成《列朝诗集》，对胡侍作了比较具体的介绍。《列朝诗集》丙集胡侍小传谓：

胡判官侍：侍字承之，咸宁人，正德丁丑进士，授刑部主事，进员外，历鸿胪少卿。嘉靖初追尊献帝，议者力辩两考之非。承之上言：“祖训：兄终弟及，盖严嫡庶、防觊觎耳，鲁婴齐不受命归父，汉病已不受命昭帝，何以受命为哉？唐睿宗不当兄中宗，宋太宗不当兄艺祖，以其为君也。不当称兄，则不当称伯明矣。”上怒其狂率，出为潞州判官，乙酉，下诏狱，除名为民，戊戌，有诏追复。承之初以不附议谪官，阙后下狱，不知所坐。许伯诚志其墓，骈语填塞，无所考焉。（顺治九年毛晋刻本《列朝诗集》原题“胡同知侍”，因与传文中“潞州判官”不符，故陆灿辑《列朝诗集小传》、许逸民等点校《列朝诗集》皆改为“胡判官侍”。这则小传与晚明过庭训纂《本朝分省人物考》胡侍条目的内容一脉相承）

《明史》卷一九一《薛蕙传》附胡侍传载：

胡侍，宁夏人，举进士，历官鸿胪少卿。张璠、桂萼既擢学士，侍劾二人越礼背经。因据所奏，反覆论辩，凡千余言。帝怒，命逮治。言官论救。谪为潞州同知，沈府宗室勋注以事憾之，奏侍试诸生题讥刺，且谤“大礼”，逮至京，讯斥为民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子部杂家类存目四《真珠船》提要称：

《真珠船》八卷，明胡侍撰。侍字奉之，号蒙溪，咸宁人，正德丁丑进士，官至鸿胪寺少卿，坐议大礼，谪潞州同知。

不难看出，以上有关胡侍的字号、籍贯以及生平、著述概况的传述，众说纷纭，互相矛盾，有必要考辨厘清。

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藏有古籍善本《胡蒙谿集》和《胡蒙谿续集》（善本编号：集250.158）。其中，《胡蒙谿续集》附录有《胡蒙谿墓志铭》，题《明故奉政大夫鸿胪寺右少卿蒙谿胡公墓志铭》，由胡侍挚友许宗鲁撰。志曰：

公姓胡氏，讳侍，字承之，别号蒙谿，应天府溧阳人也。国初讳士真者，明医术，坐累谪戍陕西宁夏卫，历四世皆为宁夏人。至司马公卒，赐葬陕西咸宁，子姓得守冢墓，遂为韦曲里人。公少治书，为县学生员，正德癸酉，举乡试，丁丑，举进

士，戊寅，授刑部云南司主事，辛巳，晋广东司员外郎，壬午，晋鸿胪寺右少卿，甲申，谪授山西潞州同知，乙酉，下诏狱，事白，夺秩编民，戊戌，诏复其官，癸丑十二月四日，考终于家，距生弘治壬子十一月六日，得寿六十有二……所著有《蒙谿集》三卷、《续集》一卷、《野谈》二卷、《真珠船》二卷、《关资》二卷、《清凉经》一卷，传之于世……

这篇墓志铭对胡侍的字、号、生平作了比较完整的交代，它对胡侍籍贯的说明，也与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》胡侍籍贯及祖籍的标示完全吻合，当属确切。但是，许宗鲁对胡侍著述情况的介绍则不大准确。据查，善本《胡蒙谿集》共四卷（嘉靖二十五年刻本），《胡蒙谿续集》共六卷（嘉靖三十一年刻本）。焦竑撰《国史经籍志》卷四称“胡侍：《蒙谿集》十一卷，又《续集》五卷”，或另有所据，不详其本。《真珠船》八卷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收录，题识咸宁胡承之著，有嘉靖二十七年“关西蒙谿山人胡侍自序”）。《野谈》六卷（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刻本，卷首有嘉靖二十五年乔世宁序。《国史经籍志》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载记《真珠船》、《野谈》卷目亦与此相合。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所收《野谈》据百陵学山本影印，只一卷）。这些作品都刊行于胡侍生前。许宗鲁对此理当详察而疏失如此，难怪钱谦益严厉批评“许伯诚（许宗鲁字伯诚）志其墓，骈语填塞，无所考焉”。

辨析以上材料可知：胡侍，字承之，号蒙谿（或作蒙溪、蒙溪山人），祖籍应天府溧阳。祖上曾谪戍陕西宁夏卫，后入籍陕西咸宁（今西安）。胡侍生于弘治五年，正德十二年举进士，授刑部云南司主事，十六年，晋广东司员外郎，嘉靖元年，晋鸿胪寺右少卿，三年，因“大礼议”案谪山西潞州同知，四年，因宗室憾攻而入狱，夺官编民，十七年诏复，嘉靖三十二年考终，寿六十二。著述有《蒙谿集》四卷，《蒙谿续集》六卷，《真珠船》八卷，《野谈》六卷，皆有刻本传世，另外两部作品《关资》和《清凉经》，虽曾刊行问世，而今已散佚不详。

综上考辨，关于胡侍的字号、籍贯、生平、著述等问题，《国朝名公翰藻》、《本朝分省人物考》、《皇明诗选》、《列朝诗集》、《明史》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等文献的相关内容，乃至《胡蒙谿墓志铭》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。而这些文献的影响又都比较大，屡被转述或被引以为据，辗转讹误也就在所难免，甚至造成集诸家之误于一炉的情况，《明诗话全编》就是一例，其第五册中“胡侍诗话”下题：

胡侍，约1536年前后在世，字奉之，号蒙溪，

又号濂溪山人，宁夏人，正德进士，历官鸿胪少卿。世宗朝时，张璠、桂萼既擢学士，侍勤二人越礼背经。世宗怒，命逮治，言官论救。谪为潞州同知，后明宗室朱勛注奏劾他试诸生题讥刺，且诽谤“大礼”，遂斥为民，著有《真珠船》、《野谈》。

很显然，这则简介在胡侍的生平、字及籍贯三个基本方面皆因失察而误。除以上引及者外，其他如《古今图书集成》（氏族典胡姓部）、《明诗纪事》（陈田辑）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（臧励榘等编）、《明人传记资料索引》（“国立中央图书馆”编）、《四库大辞典》（李学勤等编）、《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》（黄惠贤主编）等文献中有关胡侍字号、籍贯、生平以及著述的内容也都不准确，皆不足为据。

胡侍著作《真珠船》涉及诗文、词曲、音韵以及名物制度等，记述考证兼有，语言轻简质朴。虽然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讥其“征引拉杂，考证甚疏”，但是其中的部分诗话、曲论还是受到人们的重视。《明诗话全编》“胡侍诗话”辑录的诗话七则即出此书。曲论如

“南北音”、“北曲”、“元曲”数则，内容和观点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“元曲”一则关于元代曲家“以其有用之才，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，以抒其拂郁感慨之怀，所谓‘不得其平而鸣焉’”之说（《丛书集成初编》第338册《真珠船》第35页），影响就很大，在明清曲论家的元曲研究中多有称引。“南北音”、“北曲”二则既反映了明代正德、嘉靖之际北方文人士大夫关注南曲并开始从理论上研究南曲的动态，其对北声、南音的溯源考察也颇为晚明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所重。王骥德著《曲律》，就对胡侍之说进行了引述和申论。可是王骥德在征引胡侍曲论的时候，却将书名《真珠船》误作《珍珠船》（按：《珍珠船》乃晚明山人陈继儒之杂著）。清人姚燮作《今乐考证》，从《曲律》转述相关内容，又以讹传讹。中国戏曲研究院编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》收录《曲律》、《今乐考证》以及今人校注《曲律》作《王骥德〈曲律〉》时，皆未能就此作出正确校勘。

[作者单位：厦门大学中文系]

方成培《词榘》稿本考略

鲍 恒

方成培，字仰松，号岫云，又号后岩，徽州横山（今安徽省黄山市歙县）人，具体生卒年已不可考，其生活时代大致在清代康熙年间。方成培为有清一代徽州著名学者和卓有成就的艺术家，所学甚博，涉猎颇广，在医学、文学、艺术、戏曲等方面均有深入研究，多有建树。其于词曲之学尤其精心，特别是因他精通音乐，自可操琴，有着切身的音乐体验，故能考证律吕，于词曲乐律多有发现、发明。其词曲音律专著《香研居词麈》早已为词学界所熟悉，但其尚有一部重要的词谱专著却鲜为人知。此书方氏拟定名为《词榘》，因未刊行，只存稿本，未得流传，词学界多未能见其面目，故现今各类词学目录及专著中均未提及，殊多遗憾。笔者经多方访求，得窥《词榘》稿本，兹将此书略作考订，冀为词学界所共识。

《词榘》稿本之著录

方成培《词榘》虽成书于清中叶，但当时并未刊

行，故知之者甚少。据笔者所见，迄今为止，清人各种相关目录及著述中尚未见提及。可见，《词榘》一书在清代近乎无闻，而其稿本情况更无人知晓。

对《词榘》稿本最早予以著录的当推1937年刊行的《歙县志》。《歙县志》全志十六卷，其卷十四《人物志·文苑传》记载：“（方成培）又汇诸家词曲考订格律，为书二十六卷，名曰《词榘》，凡三易稿。……成培所撰《词榘》手写本，今尚存其半。”据此记录，可知当时所见《词榘》仅存一半（即十三卷），但具体内容未加详述，也未交代仅存其半的稿本之来源与藏存之处。

其后，成书于1946年的《歙事闲谭》对《词榘》稿本情况作了较为具体的记叙，其卷二十七云：

方仰松（成培）于《词麈》外，复著有《词榘》一书，顷于丰南得精写袖珍本，卷五至卷八、卷十一至卷十六、卷二十三至卷二十五，共七册，余均缺失。每卷首书“古歙方成培仰松辑、同学吴绍江锦舟校”。援据甚博，核谱极精，时纠正万红